



蠔鏡和 Oquem 再考釋

章文欽*

本文在戴裔煊先生及中外學者研究的基礎上，對“蠔鏡”和Oquem這對澳門歷史上十分重要的名稱，從地名學、文獻學、民俗學及語言學諸方面作進一步研究，證明戴裔煊先生的考釋是經得起考驗的。其中略有補充的是，“蠔鏡”的名稱在中國文獻中最早應見於明代正德年間，而非通常所說的嘉靖初年。戴先生以Oquem為“蠔鏡”的閩南潮州方言的音譯，以Oquem為福建或福建的港口者，則以16世紀的葡文記載謂其地為琉球人貿易的港口。本文根據唐代以來的中國文獻，證明自唐代至明代，廣州口岸(包括澳門在內)一直是琉球朝貢和貿易的港口，從而證明戴先生的考證無誤。

引 言

為參加“大航海時期的中外貿易與澳門”研討會，筆者原擬的題目為“明代與葡人活動有關的嶺南地名考釋”，原擬考釋的地名有七八個。因近期忙於做梁嘉彬先生文集等事，結果祇好做其中可能是最重要的蠔鏡和Oquem考釋。

蠔鏡是見諸中國文獻的澳門最早的名稱，學術界一般沒有爭議，但不等於沒有進一步探討的餘地。Oquem 就是蠔鏡，抑或是福建，或福建的港口？則學術界至今仍有爭議。看似簡單的名稱，牽涉到地名學、文獻學、民俗學、語言學諸方面的問題。

筆者在三十年前開始學術生涯時，承業師蔡鴻生先生示教，將《澳門紀略》列為三種必讀書之一，已見到“蠔鏡”的名稱。其後追隨業師戴裔煊先生研究澳門史，深受他的遺著《〈明史·佛郎機傳〉箋正》影響，包括他對蠔鏡和Oquem的考釋。接着又見到若干與之不無異同的考釋。筆者無意於將拙文寫成商榷文章，祇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，就歷年讀書所得，對這個問題作進一步的探討。

蠔鏡再考釋

蠔鏡一名，見諸中國文獻，通常認為始於明代嘉靖年間。筆者以為至少可上溯到正德年間。清初尤侗〈默德那竹枝詞〉云：

香山濠鏡辨光芒，妙女兒千進秘方。

最是同儕多意氣，鄭莊千里不齋糧。

——回回識寶附舶香山濠鏡澳貿易，
正德中進女你兒千，於永獻房中秘方。⁽¹⁾

《明史》載：

(錢寧)引樂工臧賢、回回人於永及諸番僧以秘戲進，請於禁內建豹房新寺，恣聲伎為樂。⁽²⁾

在葡萄牙人到來以前，蠔鏡澳已經是廣州沿海一個東南亞南海各國商人貿易的海澳。來自默德那(即麥地那)的阿拉伯商人，也是當年濠鏡澳的客商，他們不但在這裡進行珍異珠寶的貿易，而且向明廷進獻回回美女和房中秘方。正德是明

* 章文欽，中山大學中外關係史博士，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，廣州大學廣州十三行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、研究員，廣東省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。



武宗的年號(1506-1521)，明武宗是歷史上有名的浪子皇帝，這一着正投其所好。尤侗於康熙十八年(1679)入明史館，撰《明史·外國傳》三百餘篇，並撰《外國竹枝詞》和《明史新樂府》，與《明史·錢寧傳》相印證，其記載當有所據。

從正德年間再上溯，據明香山人黃佐載：

正統十年(1445)，按察副使章格巡視海道，時流求使臣蔡璇等率數人以方物買賣鄰國，飄至香山港，守備當以海寇，欲戮之以為功。格不可，為之辯奏，還其貲而遣之。番夷頌德。⁽³⁾

此香山港可以是蠓鏡澳，也可以是浪白澳。如果從流求難船漂流的方向來說，則以蠓鏡為近，浪白為遠，飄至濠鏡的可能性更大。惜文獻無徵，尚難確定。

從正德年間往下溯，黃佐又載：

正德十二年(1517)，西海夷人佛郎機亦稱朝貢，突入東莞縣，火銃迅烈，震駭遠邇，殘掠甚至，炙食少兒。海道奉命誅逐，乃出境。自是海舶悉行禁止，例應入貢諸番亦鮮有至者。貢舶乃往漳泉，廣城市貿蕭然，非舊制矣。於是兩廣巡撫都御史林富稽《祖訓》，遵《會典》，奏上得允，於是番舶乃通焉。

下文附載林富〈請通市舶疏〉，並於正文“灣泊有定所”下附載：

布政司案：查得遞年暹羅國並該國管下甘蒲柘、六坤州與滿刺加、順塔、占城各國夷船，或灣泊新寧廣海、望崗，或新會奇潭，香山浪白、蠓鏡、十字門，或東莞難栖、屯門、虎頭門等處海澳，灣泊不一。

復於正文“抽分有則例”下附載：

布政司案：查得正統年間以迄弘治，節年俱無抽分。(……) 正德十六年(1521)，滿刺加國奏佛郎機奪國及進貢詐偽，議禮部。議行鎮

巡等官遣發出境。嘉靖五年(1526)，又該姚都御史奏稱：暹羅國進貢，將陪貢附搭貨物十分抽二，以備軍餉，方物解京。嘉靖六年(1527)，該國副使坤思悅者米德利等奏稱，正船並無抽分。該禮部查得：《會典》內該國例不抽分，行回將原抽貨物退還，變賣修船歸國。遵行到今。⁽⁴⁾

戴裔煊先生考釋稱，林富的奏疏作於嘉靖八年(1529)，“此疏是黃佐代作，見《泰泉集》卷二〇，原作題為‘代巡撫通市舶疏’。此外，嚴從簡《殊域周咨錄》卷九〈佛郎機〉條及顧炎武《天下郡國利病書》原編第三三冊〈交趾西南夷〉部分俱有所轉載。”⁽⁵⁾ 戴先生將黃佐起草的奏疏初稿與《殊域周咨錄》所載林富上奏朝廷的疏文對校，以糾正《明史·佛郎機傳》所謂林富奏請“許佛郎機互市有四利”的錯誤。

黃佐為明代廣東屈指可數的博學通儒，前引《廣東通志》修成於嘉靖三十九年(1560)，歷時三載而成，採摭資料至為豐富。“布政司案”的兩段按語，採自官方檔案。第二段所引檔案至嘉靖六年(1527)止，末尾謂“遵行到今”，“今”應指林富上疏的嘉靖八年。而第一段起首謂“查得遞年”，即謂在此之前，歷年以來，蠓鏡即為廣州沿海對外貿易的海澳之一。

蠓鏡在《明史·佛郎機傳》中作“壕鏡”，戴先生考釋謂：

“壕鏡”這個名稱，在明代著作中有作“濠境”(如陳吾德〈條陳東粵疏〉、霍與瑕〈處濠境澳議〉等等是)。(……)把“蠓”寫作“濠”或“壕”與鏡連用，在文字上是沒有甚麼意義的。可能因嫌其原名不雅馴而改寫作“濠”，遂習非成是。⁽⁶⁾

至於何以稱為蠓鏡，《澳門紀略》謂：

有南北二灣，可以泊船，(……) 二灣規圓如鏡，故曰濠鏡。⁽⁷⁾

此書成於乾隆十六年(1751)，著者印光任、張汝



霖為首任及第三任澳門同知，對“濠鏡”應作“蠔鏡”大約已不甚了了。戴先生謂：

蠔鏡是蠔的外殼的一部分，平滑如鏡，故名。廣東沿海一帶地方，往日婦女裁衣服時，常用蠔鏡畫白色粉綫在布上為尺寸長短記號。顯然，蠔鏡澳得名是因其形似蠔鏡之故。⁽⁸⁾

戴先生家鄉陽江，為廣東濱海縣份，本人為歷史學家兼民族學家，注意到“往日婦女裁衣服時，常用蠔鏡畫白色粉綫在布上為尺寸長短記號”這一廣東沿海地方民俗。筆者家鄉汕頭也有這一民俗，五十多年前，常常看到祖母做衣服時用蠔鏡在布上畫粉綫，然後再裁縫製。當時還有一種稱為“蠔鏡鈴”的玩具。可見蠔鏡與廣東沿海地方民俗的關係。

至於蠔鏡究竟為何物，明末何喬遠謂：

海月，海蛤類也，一名蠔鏡。形圓如月，亦謂海鏡。土人磨之使通明，鱗次以為天窗。⁽⁹⁾

海月之名，可上溯到晉代郭璞〈江賦〉：“玉珧海月，土肉石華。”李善〈註〉引東吳《臨海水土物志》：“海月大如鏡，白色正圓。”⁽¹⁰⁾戴先生所說的蠔即牡蠣與郭璞、何喬遠所說的海月雖有差別，但古人將其同歸入貝蛤類海生動物，現代生物學將其同歸入瓣鰓綱，即軟體動物門的一綱，可見兩者相去未遠。

Oquem 再考釋

Oquem 一詞見托梅·皮雷斯的《東方概說》（或譯作《東方的蘇馬》）。戴裔煊先生考釋謂：

葡萄牙殖民者來到滿刺加以後，就已經打聽到有蠔鏡澳。我們知道當1512-1515年托梅·皮雷斯（Tomé Pires）在滿刺加和柯枝（Cochin）之時，寫有《東方的蘇馬》（*Suma Oriental*）進呈於葡萄牙國王，在他的原稿第162頁寫道：“除廣州港口之外，另有一港名蠔鏡；陸行三日程，海行一日一夜。”蠔鏡原文作 Oquem

即‘蠔鏡’的譯音，這顯然是葡萄牙殖民者就閩南和潮州方言所作的葡文音譯。⁽¹¹⁾

金國平先生引述托梅·皮雷斯的同一段記載較為完整：

除廣州港外，尚有一港名 Oquem。陸程三天，水路晝夜可至。此為琉球人及其它國家使用的港口。此外，尚有多處港口，需長篇巨幅方可完述，故不擬在此贅言。本人範圍僅至廣州，因為它是打開中華王國的鑰匙。⁽¹²⁾

戴先生與葡萄牙學者布拉加（J. M. Braga）都認為 Oquem 是蠔鏡的葡文音譯，意見相同的還有郭永亮，郭氏謂：

第一位入華葡萄牙大使，多默比萊斯（Tomé Pires），在他的信札裡，記廣州與澳門的距離說：“在廣州港外，有一個名叫濠鏡的地方，去廣州，陸路可三日程，水路則可一日夜。”⁽¹³⁾

按筆者的理解，戴先生確定 Oquem 為蠔鏡的根據有二：一是托梅·皮雷斯所載的 Oquem 這個港口，是以廣州港為比對方位，陸行三日程，海行一日一夜。二是 Oquem 為閩南潮州方言對蠔鏡的音譯。

這裡牽涉到對音問題。所謂對音，就是把外文記載中的中國人名、地名還原為中文，或把中文記載中的外國人名、地名還原為外文，這是研究中外關係史經常碰到的一個問題。其中就地名一端，按照國際地名學的原則，無論外國人如何稱呼，都應該還原為本國固有的名字。20世紀80年代筆者擔任戴先生的學術助手時承示教：“岑仲勉先生考證西北史地，喜歡用對音。陳寅恪先生則覺得這種方法用得不當，容易穿鑿武斷，應當慎重。”要正確使用對音方法，必須對有關的歷史、地理和語言知識有比較全面深入的瞭解，如果僅僅覺得語音相近，便貿然轉譯過來，變成濫用對音，往往要鬧笑話。中外學術界這樣的笑



話不少。就這一問題而言，戴先生的考釋是經得起檢驗的。

筆者再就金國平先生引述的文字進行驗證，文末謂“本文範圍僅至廣州”，與上文以廣州為 Oquem 比對方位相合。至於“此為琉球人及其它國家使用的港口”之句，或以為與蠓鏡的條件有所不合，因為明代與琉球通貢使的港口一般為泉州。《明史》卷八一〈食貨志·市舶〉載：

海外諸國入貢，許附載方物與中國貿易，因設市舶司，置提舉官以領之。(……)洪武初，設於太倉黃渡，尋罷。復設於寧波、泉州、廣州。寧波通日本，泉州通琉球，廣州通占城、暹羅、西洋諸國。

但我們讀嘉靖八年(1529)林富上疏請通市舶時刑科給事中東莞王希文所上的〈重邊防以蘇民命疏〉便可得到解決，疏中謂：

且如番舶一節，東南地控夷邦，而暹羅、占城、琉球、爪哇、淳泥五國貢獻，道經於東莞。(……)來有定期，舟有定數，比對符驗相同，乃為伴送，附搭貨物，官給鈔買。⁽¹⁴⁾

所謂貢道經東莞，即經廣州，包括蠓鏡在內的廣州沿海對外貿易的海澳，自然也就成為琉球人使用的港口，直到嘉靖初年還是這樣。

可與此相應證的是，康熙間萬斯同所撰而冠以王鴻緒之名刊行的《明史稿》及乾隆初張廷玉主修的《明史》，兩書中的〈佛郎機傳〉俱載：

先是，暹羅、占城、爪哇、琉球、淳泥諸國互市，俱在廣州，設市舶司領之。正德時移於高州之電白縣。

顯然明代琉球互市在廣州之說沿用王希文等的說法。而廣東市舶司正德時移於高州之電白縣之說，戴先生在〈《明史·佛郎機傳》箋正〉及〈關於葡人入據澳門的年代問題〉中已證其誤。

進而言之，琉球與廣州的關係，可以上溯到唐代。梁嘉彬先生〈小琉球考〉一文稱：

琉球人(沖繩人)則自唐已北通日本、新羅，南通廣州，用唐代中國、日本史料參證無訛。⁽¹⁵⁾

證以唐代史料，韓愈以鄭權任嶺南節度使，有《送鄭尚書序》，謂：

其海外雜國，若耽浮羅、流求、毛人、夷亶之州，林邑、扶南、真臘、於陀利之屬，東南際天，地以萬數，或時候風潮朝貢。⁽¹⁶⁾

柳宗元〈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〉則謂：

其外大海多蠻夷，由流求、訶陵，流求、訶陵二國，皆南番。(……)環水而國以百數，則統於押蕃舶使焉。嶺南節度使兼押蕃舶使。⁽¹⁷⁾

據此可證廣州為琉球貢道所經，且有貿易交往，由來已久。

再從語言學的角度進行驗證，Oquem 一詞，分為兩個音節 O-quem，與閩南潮州方言“蠓鏡”二字的對音相合。而據瑞典龍思泰(Anders Ljungstedt)所載，澳門附近有地名 Oitem or Oiteng，在明末被劃為葡萄牙耶穌會士陸若漢(John Rodrigues)的葬地。“此地距娘媽角礮臺很近，在港口的入口處，又幾乎正對着馬騮洲。”⁽¹⁸⁾ Oitem 或 Oiteng 亦可分為兩個音節 Oi-tem 或 Oi-teng，與閩南潮州方言“蠓埕”二字的對音相合。蠓埕即蠓田，為內十字門四山之一，如《澳門紀略》謂：“其南有四山，曰蠓田，曰馬騮，曰上濶，曰芒洲，為內十字門。”⁽¹⁹⁾其地今屬珠海市。

Oquem 這一閩南潮州方言“蠓鏡”的葡文音譯，蓋源於當年在滿刺加一帶貿易的閩南潮州商人和通事。據嘉靖四十三年(1564)御史南海龐尚鵬奏疏所載，在葡人入居澳門以前，來粵葡船的通事，“多漳、泉、寧、紹及東莞、新會人為之，椎髻環耳，效番衣服聲音”⁽²⁰⁾。椎髻環耳正是滿刺加一帶風俗。而 Oitem 或 Oiteng 這一閩南潮州方言“蠓埕”的葡文音譯，蓋源於當年居

住和活動在蠔田附近一帶的閩南潮州人。兩者可以相互印證。

或有以 Oquem 為“福建”的葡文音譯的學者，以西班牙人將福建音譯為 Ochiam 作佐證。⁽²¹⁾其實這是一個罕見的不正確的音譯。筆者曾請教閱讀過大量關於中國的西文檔案手稿的蘇精教授：西文關於福建的“福”字有沒有以 O 字母開頭的？承告以通常為以 F 或 H 字母開頭。又查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藏 1575 年葡萄牙人繪製的東印度地圖，中國東南沿海與 Formosa（臺灣）相對之處為 Fujun。⁽²²⁾再查約二十年前香港出版的《中葡字典》，福州葡文寫作 Foochow。⁽²³⁾因此將福建音譯為 Ochiam 毋寧說是一個例外。

結語

吾師姜伯勤教授在〈澳門普濟禪院藏澹歸金堡日記研究〉一文寫道：“遙記 1970 年初夏，戴裔煊先生與劉節先生短期到英德仙橋五七幹校，一星期日上午，戴先生隨意在涼席上休息，對劉節先生說：‘我就是對我的《〈明史·佛郎機傳〉箋正》放心不下。’一向違歡的劉節先生以好言相勸，以寬心之話慰解。其時晚生三十有二，於彼情彼景下聽得此言，對戴先生執着於學問之心，由衷敬佩。今草此文，作為對戴先生的紀念，也作為對當日寬慰戴先生之劉節先生的紀念。”⁽²⁴⁾

1970 年，那是一個讀書無用，著書有罪，“知識越多越反動”的年代，居然有一個“從舊社會過來的資產階級智識分子”，在牽掛着自己尚未完成的《〈明史·佛郎機傳〉箋正》這部書。不久，老先生從“五·七”乾校返回中山大學，即冒着再被批鬥抄家的風險撰成此書，並加上副題“葡萄牙殖民者佔據中國領土澳門史料”，希望為日後收回祖國領土澳門的正義事業提供參考。此書撰成後，當時有人說它“太右”。至 1984 年，堅冰消融，嚴冬已過，得以問世，卻不斷有人說它“太左”。

平心而論，這是一位對國家民族懷着赤誠之心，對學問終身執着追求的前輩學者，在極為艱難的情況下撰成的。至今仍然閃耀着學術的光芒，其中的立論考釋，具有紮實的文獻基礎和嚴

密的邏輯論證，經得起學術界的驗證，對蠔鏡和 Oquem 的考釋便是如此。筆者以二十多年的讀書所得作進一步的探索，祇不過在史料上和某些論點上略有補充而已。學術研究是一項艱難寂寞的事業，容不得功利和浮躁，祇能在十分尊重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去追尋，去探索。所作的成果能否經得起學術界的檢驗，祇能由別人去評判，由後人去評判。若採用“文壇登龍”的手法，擺出“捨我其誰”的姿態，不但無補於學術，最終還害了自己。

【註】

- (1) 尤侗《西堂全集》，第 11 冊〈外國竹枝詞〉。
- (2) 《明史》，卷三〇七〈倭幸·錢寧傳〉。
- (3) 黃佐《廣東通志》，卷六六〈外志·夷情上·番夷〉。
- (4) 黃佐《廣東通志》，卷六六〈外志·夷情上·番夷〉。
- (5) 戴裔煊《〈明史·佛郎機傳〉箋正》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4 年版，頁 28。
- (6) 戴裔煊《〈明史·佛郎機傳〉箋正》，頁 52-53。
- (7) 印光任、張汝霖《澳門紀略》，卷上〈形勢篇〉。
- (8) 戴裔煊《〈明史·佛郎機傳〉箋正》，頁 53。
- (9) 何喬遠《閩書》，卷一五一。
- (10) 蕭統編、李善注《文選》，中華書局 1977 年版，頁 185。
- (11) 戴裔煊《〈明史·佛郎機傳〉箋正》，頁 53。其中引托梅·皮雷斯之文見 J. M. Braga, *The Western Pioneers and their Discovery of Macao, Macau, 1949*, p. 102。
- (12) 阿爾曼多·科爾特藏 (Armando Cortesão)《東方簡志》(即《東方概說》)，科英布拉大學出版社 1978 年版，頁 368-369，轉引自金國平《中葡關係史地考證》，澳門基金會 2000 年版，頁 15。
- (13) 郭永亮《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》，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0 年版，頁 1。
- (14) 王希文《石屏遺集》卷上〈疏〉；印光任、張汝霖《澳門紀略》，卷上〈官守篇〉。
- (15) 《臺灣文獻季刊》，第十九卷第一期（1968 年 3 月），頁 168。
- (16) 韓愈《韓昌黎全集》，卷二一〈序〉三。
- (17) 柳宗元《柳河東集》，卷二六〈記官署〉。
- (18) Andrew Ljungstedt, *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 in China;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*, Boston, 1836, pp. 140-141。
- (19) 印光任、張汝霖《澳門紀略》，卷上〈形勢篇〉。
- (20) 陳子龍等編《明經世文編》，卷三五七；印光任、張汝霖《澳門紀略》，卷上〈官守篇〉。
- (21) 見門多薩撰、何高濟譯《中華大帝國史》，北京中華書局 1998 年版，頁 41。
- (22) 《東アジヤ中世紀海道——海商·港·沈沒船》，千葉、大阪、山口 2005 年版，頁 18。
- (23) 《中葡字典》，香港國際語言中心出版，頁 193。
- (24) 蔡鴻生主編：《戴裔煊先生九十誕辰紀念文集——澳門史與中西交通研究》，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，頁 31。